

世界文化丛书

A SERIES OF
THE CULTURES OF THE WORLD



希腊方式

——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

[美] 伊迪丝·汉密尔顿著 徐齐平译



希腊方式

——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

[美] 伊迪丝·汉密尔顿著 徐齐平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 池长尧

希腊方式

——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著

徐齐平 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10 000

1988年11月第 1 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700

ISBN 7-213-00234-1/G·42

定 价： 2.95 元

《世界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周谷城 田汝康

编委：庄锡昌(常务) 金重远 庞卓恒 迟 轲

祝 明 朱威烈 顾晓鸣 顾云深

马小鹤 孙志民 张宪章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今天我们立足于祖国的现代化，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不难看出：现在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日益趋于紧密，各国家或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日益方便，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日趋紧密，几乎成了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但要使这些关系发展得很好，甚至合乎我们的理想，则研究、考察、寻找正确方向或理想前途的工夫，为不可少。着眼于文化方面的关系，组织学者、专家研究世界文化，出版世界文化丛书，已成了我们当前的迫切要求。

研究世界文化，先定出题目，请学者进行研究，写成专书，是可能的。学者自己先有研究计划，甚至已有研究成果，拿出来寻找适当的题目，更是可能的。我们组稿工作的进行，大体不外这些方式。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不加限制，是可以的，如“世界文化史”即属此类；估计这类著作不会很多。与此相反，每一本书所涉的地区、时间、文化内容都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研究”即属此类；估计这样有限制的著作，一定相当多。介于这两极端之间，有的著作只在地区、时间上有所限制，如“中国先秦文化”或“美国现代文化”即是实例。有的甚至只在地区上有限制，如“印度文化”或“拜占庭文化”即是实例。此外研究文化的方法或理论，如“文化与时间”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

理论”等都是实例。范围这样无定，体例这样不齐，只是由于世界文化从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到今天更是日新月异，不易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不过，不把范围体例固定下来，反而使学者、专家易于着笔或易于发挥各人的独创性。

至于文化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则不能忽视。发展的方向或理想的前途是不易明确的，这就要诉诸比较研究。即使诉诸比较研究，如果只拿现在与过去比，或拿中国与外国比，充其量只能了解文化的大势；必须进一步有具体细致的比较，才能把方向找出来。分别举例，如手工生产与机器生产相比，则知手工生产为落后，机器生产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落后、追求进步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宗教迷信与科学真理相比，则知宗教迷信为落后，科学真理是进步的，于是反对迷信、追求真理成了我们的方向。又如压迫和剥削，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情；拿压迫剥削与平等互利相比，则知前者为可恨，后者是可贵的，于是反对压迫剥削、追求平等互利成了我们的方向。方向不能忽视，比较研究则大有助于方向的阐明。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专家未必完全没有涉及过比较：把研究的对象完全孤立起来，不顾上下古今，不顾前后左右，是不可能的。今天谈比较，不过希望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再扩大，使比较的对象力求具体更具体。果能如是，则研究文化的方向或追求理想的前途决不会落空。余不多谈，即以此为序。

1986年10月6日写于北京

目 录

世界文化丛书序 周谷城

-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 1
- 第二章 理性与精神 14
- 第三章 东方与西方的艺术形式 34
- 第四章 希腊的文章风格 49
- 第五章 品达——希腊的最后一位贵族 65
- 第六章 柏拉图笔下的雅典人 82
- 第七章 阿里斯托芬与旧喜剧 101
- 第八章 希罗多德——第一位周游列国的人 131
- 第九章 修昔迪底斯——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153
- 第十章 色诺芬——一位普通的雅典绅士 171
- 第十一章 什么是悲剧 191
- 第十二章 埃斯库罗斯——第一位剧作家 202
- 第十三章 索福克勒斯——希腊人的楷模 221
- 第十四章 欧里庇得斯——现代思想的先驱 234
- 第十五章 希腊的宗教 246
- 第十六章 希腊的方式 263
- 第十七章 现代世界的方式 290

第一章 东方与西方

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一个人群集居、文明进化的地区的西部偏远边界上，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派新兴的、不同于寻常的势力，十分活跃。那里的人们的心灵与智慧受到了某种感化与启发，开始了觉醒。这一觉醒对于后来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终非一个世纪复一个世纪的时间长河的缓慢流逝，以及历史进程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能泯灭。雅典开创了它的短暂的、但是极其辉煌的百花争艳、千贤争雄的时期。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精神与智慧的世界，以致今天我们的的心灵与思维不同于一般。那时候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直到现在都没有被人们所超越，达到它们水平的例子也寥寥无几。西方世界中所有的艺术和思想意识都有它们的烙印。在这一伟大时期发展到了它的飞黄腾达阶段的时候，古代世界的繁荣昌盛的人类文明已经衰落，“放任的野蛮性”的黑影笼罩着整个大地。在这个黑暗的、严峻的世界中，一个规模不大、但情绪激昂到了白热化程度的精神能源中心正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与影响。一个崭新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类文明在雅典兴起了。

这个新的发展是怎样产生的？希腊人是怎样取得这些成就的？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旧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倒不仅

仅是因为希腊人有理由要求我们对她重视。由于精神上的和思想上的继承性，我们的身上有着希腊的传统，它的深远的影响历经世纪的更替而不衰，它以理性的光芒和美的甘露感染了狂野的北部原始人^①，即使我们要想避免它的影响也不可能。希腊对我们同样有直接的贡献。真正的希腊遗迹已经不多了，况且它们离开我们十分遥远。空间的间隔和奇怪的、困难的语言障碍，使人们认为希腊的遗迹只是旅行者与专家学者们所关心的对象而已。其实，希腊人的发现，或者说他们获得成就的方式，以及他们怎样促使新世界从分崩离析的旧世界的黑暗与混乱中诞生出来，对于我们今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一、二十年内，我们亲身经历了一个旧世界的消亡。在目前的混乱和令人迷惑的状态中，研究希腊人澄清思想的方式和肯定艺术的途径是不无裨益的。虽然，当时人们所面对的生活条件和我们今天的实际迥然不同。不过我们不能忘记，发生在生活外部的变化尽管很大，但它的内部变化实乃微细。何况，生活经验又是一本读之不尽的教科书，我们永远不可能毕业。不论过去的或现在的伟大著作，都是人们心灵智慧的结晶，伟大的艺术是外部世界的要求和内在世界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冲突的统一。无论就伟大的著作或伟大的艺术所取得的进展而言，似乎都不很显著。

在希腊人所创造的全部成果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流传到了我们的手中。而且，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一小部分是不是它的最优秀部分。不过话要说回来，假如有办法知道的话，倒是奇怪的了。因为在很早以前的急剧动荡的世界中，并没有一条

^①指早期生活在欧洲北部尚未文明开化的人们。——译注（下同，不另注出）

法律，保证艺术作品的“适者生存”。然而，从混乱的情况下的巧合和机遇中幸存下来的那些残余作品，已经足以说明希腊人在思想意识和艺术美学各个领域中所达到的水平高度。没有别的雕塑可以同他们的作品相媲美；没有别的建筑物更典雅雄伟；没有别篇文章比他们的作品更精萃。散文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形式，希腊人只来得及刚刚着手创作，但是他们同样留下了杰作。在历史学方面，还没有人能^与修昔底底斯相匹敌；就韵文而言，除了《圣经》以外，谁也不能成为柏拉图的对^手；至于诗歌，希腊人的作品都是上乘精品；荷马的史诗，无与伦比；品达的抒情诗篇，首屈一指，谁也不能同他相提并论；四大悲剧鼻祖，三位是希腊人。可惜到今天，这批艺术珍宝留存下来的已经为数不多了。雕塑作品已经面目全非，破裂成为碎片而流失；建筑物倾^倒坍塌；画卷画幅，杳无影踪；文章著作，失之^大半。我们现在所保存的只是遗迹残骸。两千余年来，我们的世界只有这么一点东西。可是，这些来自雄伟壮观的宝库中的残余，却一直在向人们挑战，激励人们奋发努力，它们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财产中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希腊的才智终将为世人所公认，希腊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然而，一般的人们并不理解这些成就的原由，只是简单地把它们叫做希腊的奇迹。奇迹一说颇为时髦。有人认为，希腊的鲜艳的智慧花朵并不植根于任何我们可以解释的土壤中。人类学家们紧张忙碌地工作，做好了准备，要带领我们到原始森林丛中去。在那里，所有人间的事物，包括希腊的事物，都能找到它们的起源。一方面，人类学家通过亘古以来的朦胧的图景，让我们看到了种种奇怪的习俗和仪式；另一方面，在我们

面前放着希腊悲剧的剧作。在这两者之间有一道沟壑，人类学家无力帮助我们跨越过去。因此，简单的办法是不再去跨越它，不再认为有解释它的必要，而把悲剧作品看作为一个奇迹。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道路。在那些岁月中的雅典，它的思想领域和精神领域中的活动非常丰富，硕果累累，为历史上其他时代所望尘莫及，其原因已经有了解释。

人们普遍认为希腊属于古代世界，不论由哪一位历史学家在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划一条界线，希腊人不容置疑的位置是在旧世界范围之内。不过，他们在那里的位置只存在几个世纪而已，而且也没有特定的标志使他们在哪里获得一个专门的称号。就我们已经掌握的材料看来，不论在什么地方，古代世界的特征都是相同的。在埃及，在克里特或者美索不达米亚，凡是能够读到一点资料记载的地方，我们都发现下述类似的情况：暴君统治，国家事务由他的一时热情或偶然想法所决定；被统治、被奴役的人民在贫困苦难中生活；庞大的僧侣或教士组织操纵知识领域。我们所知道的今天东方国家的情况便是如此。从古代世界以来，它一直延续了几千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只是在最近几百年——也许还不到几百年——才表现出一点变化的迹象，作出了适应于现代社会要求的姿态。但是，决定它本质的精神仍然是从来不发生变化的东方精神。从远古以来，它经历了所有的时代，仍旧是原来的它，不能同一切现代的事物相融合。希腊人同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精神格格不入。在他们之前或者存在于他们周围的所有的伟大人类文明，都不能成为他们仿效的模式。西方精神、现代精神是希腊人的发现，希腊人是属于现代世界的。

罗马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许多事情使我们回想起旧的

世界，联想起东方。皇帝被奉为神明，豢养一批血腥野蛮的人，寻欢作乐，而且成为他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这是古代的东方国家模型的再现。不过，罗马精神不是东方类型的精神。一般的从事通常事务的人们是罗马精神的产物，在他们眼里，东方先哲贤人们的沉想冥想是一种最无聊的举动。“什么是真理？”彼拉多^①曾经轻蔑地问道。然而，罗马精神和希腊精神相距同样遥远。当领导地位从希腊转移到罗马的时候，希腊的思想、科学、哲学、数学以及对于世界本质及其各种形式的执着的研究也就终止了许多世纪。而上述各领域的研究正是希腊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标志。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的希腊、罗马世界具有共同的特征。其实这是神话式的虚构。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区分，西方与东方之区分，在于人们事务中的理性至上的原则——它诞生在希腊，而且在整个古代世界中只存在于希腊一个国家之中。希腊学者是第一批崇尚理性智慧的知识分子。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尚理性的先驱者出现在舞台上。

这一地位的新颖及其重要性不是轻易地就能使我们认识的。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可以理解的场所，它是由许多确切的事实组成的。关于这些事实，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了解，我们已经懂得了驾驭一些巨大的、盲目的自然力量的规律，用它们来为实现我们的目的服务。我们的主要努力在于增强对于外部物质世界的控制能力。对于那些我们大致上可以解释、并使之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事物的运动，我们绝不怀疑它们的重要性。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

^①《圣经》中的人物，审判耶稣的求地亚的总督。

是，在我们所具有的各种能力中，思考与推理是最主要的的能力。我们既不凭借想象的翅膀翱翔于世界的上空，也不借助精神启示的光亮去发掘每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奥秘。但是，我们从不间断地观察自己周围世界中事物的发生与变化。推理与思考我们观察的结果。我们主要的、具有本质特点的活动是理性活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合乎理性观念这个基础之上的。至于感情上的体验与直觉的感受只有在能够合情合理地解释的时候，才能得到承认。

希腊人生活在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中，对于世界进行理性的思考与研究。我们承认他们的成就，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不过实际情况是，即使今天我们自己的观点，也只是适用于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不能应用于东方的一望无垠的大地和亿万的人民。在东方，凡是在人们外部所发生的一切，相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根本不值得真正有聪明才智的人们的注意。对我们西方人称之为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事实进行观察与分析，在东方，是不受重视的。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念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在希腊诞生之前，在它所处的那一部分世界中，理性所起的作用曾经是微不足道的。一切重要的东西，都属于人的眼睛所无法看见的那个领域，只有灵性才知道它们。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呢？在那个领域以外的事实，凡是构成看得见、听得到和感觉得到的世界的一切事物，只起着间接的作用。精神是体验中的东西，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和触摸不着，它是每一个人所独有，不能同其他人分享的。艺术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它，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圣人和英雄在这方面最为擅长，能够

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假如他们又是艺术家的话，他们把它表达在绘画与音乐之中。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家与学者，即使是他们当中最有学问的人也做不到这一点。不过，每一个人对于精神的体验，都有自己的一份经历。

理性与精神结合起来形成某种东西，它把我们从小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使我们懂得真理，并为真理而献身。要想把理性与精神截然地分别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都属于我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借用柏拉图式的术语——把我们从不断的下坠中提升起来；或者用柏拉图最喜欢的比方来说，它赋予无形的东西以形式。然而，它们毕竟是有区别的。圣·保罗在他的著名的定义中说，凡是看得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凡是看不见的东西都是永恒的。这一定义指理性领域，即作用于可见世界的推理与思考，以及依存于不可见世界的精神领域。

在希腊诞生以前的古代世界中，凡是人们看不见的东西越来越被认为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东西。理性是新的力量，是希腊的特征。它出现在一个朝着精神方向前进的世界中，希腊有过一段短暂的时期，东方与西方在那里相会合。侧重于理性的倾向——理性是后来西方的特征——与东方的深刻的精神继承性结合了起来。如何评价清醒的理智与精神的力量相结合以后所产生的最大效果，以及对于创造性活动所发挥的巨大推动力？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下希腊诞生以前的情况，探讨一下理性处于被抑制状态而精神力量却非常强大的时候的情景。在这方面，埃及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埃及保存着最全面的历史记载，同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相比较，它更为人们所了解。因此，我们把注意力暂时地从希腊转移到古代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国家，有利于问题的讨论。

在埃及，死亡是人们的注意中心。埃及的统治权力机构是一个辉煌的帝国，人们所瞩目的问题是死亡。世世代代数以亿万计的埃及人认为死亡是他们最接近的、最熟悉的东西。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情况，假如没有那么大量的、以死亡为主题的埃及艺术作品为证的话，那是无法使人相信的。对于埃及人来说，持久的真实世界并不是他们每天沿着日常的生活道路行进中的世界，而是他们通过死亡的途径即将前往的世界。

埃及的这种情况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们的苦难悲惨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世界中，普通老百姓的境况一定是极端凄惨的。经过几千年的岁月而保存下来的庞大的艺术品，是以人的血泪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可是，人的苦难与生命从来不被认为具有任何价值。在埃及和尼尼微，没有任何东西象生命那样不值钱。正如在今天的印度，没有比生命更便宜的东西了。甚至贵族、商人及其他生活富裕的人们也同样在极其有限的安全保障下生活。有一篇从古代保存下来的墓志铭，颂扬一位了不起的埃及贵族，说他从来没有受过地方长官的鞭笞，值得敬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完全决定于他们的君主的一时心血来潮。帝王的旨意是唯一的法律。我们只要读一读泰希塔斯^①关于早期罗马的记载，了解一下在皇帝的随心所欲的专制统治下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就可以知道老百姓的安全保障在古代世界中，是一件何等稀有的商品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享受幸福的希望，便本能地转向另一个世界去寻求慰藉。安全、宁静与快乐只有在死亡者的阴曹世界中才能找到，它们是一个人终

^①罗马历史学家，大约生活在公元55—120年期间。

生追求的东西。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和它们相比，也没有它们那么真实而受到人们的珍惜。运用理性，运用思辨能力并不能使他们得到多少利益，并不能给他们任何帮助以解决一个人在来世中的地位这个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运用理性与思辨能力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希望，也不能给他们以力量去忍受不堪忍受的苦难。当人们被苦难所震愕，被苦难逼迫得走头无路的时候，他们并不向理性要求帮助。这种本能地从外部世界的事实面前的向后退缩，由于埃及国内强大的僧侣势力而大大地加剧。僧侣宣扬死亡，反对运用理性。

在希腊诞生之前，知识领域属于僧侣或教士们。僧侣是埃及的知识阶级，拥有极其巨大的权力，甚至帝王也屈从于他们。显然，如此强大的组织体系一定是由伟大的人物——圣贤或先哲——建立的。可是，他们对于原来的真理的学习和新的真理的研究，是以这种学习或研究的效果能否提高僧侣组织的威信而衡量其价值的。但是真理是一位忠贞的女子，她只对不寻求私利的追求者表露真情。随着僧侣势力的增强，任何有关削弱这个组织的力量的思想观念，都会受到冷遇。可以想象，僧侣们很快就成为问心有愧的知识分子。他们只不过是旧知识的卫道士罢了，不可能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智力。

此外，还有一个同样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必须保守在本组织范围之内，不准泄露出去。假如把它教给了人民，人民就要独立思考，其结果势必摧毁他们的权力所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谁也不允许掌握知识。无知是恐惧之源。一个人陷身在黑暗的、不可知的神秘之中，就不可能独自找到自己的出路，他必须要有一个向导以权威的口气同他说话。所以，无知乃是僧侣或者教士势力的基

础。实际上，这两者——神秘与从事神秘化的人——相互强化对方的力量，它们双方各自是对方的原因与结果。僧侣或者教士的势力依赖于神秘本身的不可捉摸性，并且竭尽全力地增强它，坚决反对任何给人们以启发的尝试。在古代世界中，理性所发挥的作用很可怜，它是由权威当局规定的——那时候，对于权威当局还没有出现反抗的呼吁——它规定思想的范围和艺术的范围，专制独裁，没有人敢表示异议。

不过，据我们所知，曾经有一个人起来同它对抗，在几年的时间里，法老的势力被动员了起来，同僧侣的势力相抗衡，最后法老的势力取得了胜利。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阿肯那顿的故事，给我们指出了庞大的僧侣组织的一个弱点。阿肯那顿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的人，从来不人云亦云。他建立了一个城镇，在那里宣传、供奉和礼拜独一无二的神。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来，这个故事从反面证实了一个事实：僧侣们都是学问渊博的人，精通人情世故，他们采取了等待的策略。那位独立思考的英雄的统治时期相当短暂——人们怀疑是不是他同僧侣势力的斗争耗尽了精力——他死以后，他所倡导的主张被禁止了，僧侣们把他的继承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纪念碑上除去了他的名字。实际上他没有触动僧侣们的势力。

不过，不论僧侣们对于这一个独裁者或那一个独裁政府的态度如何，他们始终是王权和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权势的支柱。显然，他们的本能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人民大众的苦难是他们的机会。他们所依赖的保证不仅仅在于人民群众的无知，而且还在于大众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以及被奴役的地位。当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专注于看不见的世界，而通向那个世界的钥匙又牢牢地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那么他们威权赫赫的势力就巩